



莫言演講集

莫言 著

小說
在寫我



莫言的話

- ◎魯迅有言：「世界有文學，少女有豐聲。」
- ◎沒有豐聲，少女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少女；沒有文學，世界也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 ◎所謂的文學大師，應該是能創造一個特別鮮明個性的語言的人。
- ◎好的作家必需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性。
- ◎在寫作的過程中，小說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他們突破了我的構思，我只能隨著他們走。
- ◎作家應該關注的，始終都是人的命運和遭際，以及在動盪的社會中人類感情的變異和人類理性的迷失。
- ◎飢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
- ◎小說家的自信：「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
- ◎能否寫出好的小說的關鍵在於，你有沒有強大的想像力。
- ◎文學裡有了童真、童心、童趣，才會好看。

本書是莫言應邀世

談文學，談創作，多的文學因的文學因的文學因給家的文學因緣……

獨到的見解加上莫

透過此書，讓我們

以及當代中國文學



ISBN986-7537-58-0



00250



定價250元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

文

140

麥田文學◎



莫言
著

麥田出版

小說在寫我：莫言演講集／莫言著．－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
〔民93〕面；公分．--（麥田文學；140）
ISBN 986-7537-58-0(平裝)
810.7 93004587

麥田文學 140
小說在寫我：莫言演講集

- 作者 莫言
責任編輯 林秀梅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2-23517776 傳真：886-2-23519179
-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電話：886-2-2500-0888 傳真：886-2-2500-1938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E,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458372U)
11,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 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4年4月1日
售價 NT\$250
ISBN 986-7537-58-0

目次

一·小說在寫我

- ◎ 我為什麼要寫《紅高粱家族》——在《檢察日報》通訊員學習班上的講話 9
- ◎ 我與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在台北圖書館的演講 14
- ◎ 存在下去的理由——在京都大學的演講 22
- ◎ 神祕的日本與我的文學歷程——在日本駒澤大學的即席演講 28
- ◎ 二十一世紀的日中關係——在關西日中關係學會的演講 42
- ◎ 我的《豐乳肥臀》——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 47
- ◎ 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在史丹福大學的演講 55
- ◎ 福克納大叔，你好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演講 64
- ◎ 華文出版人的新角色與挑戰——在台北出版節上的發言 72
- ◎ 城鄉經驗和寫作者的位置——在台北出版節「作家之夜」的發言 78

◎用耳朵閱讀——在雪梨大學演講

84

◎翻譯家功德無量——在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成立大會上的發言

91

◎作為老百姓寫作——在蘇州大學演講

98

◎小說的氣味——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演講

110

二·如一個孩子講故事給大人聽

◎選擇的藝術——大江健三郎與莫言、張藝謀的對話

119

◎我想做一個謙虛的人——答《圖書周刊》陳年問

130

◎答老王

136

◎與川沙談文學——加拿大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咖啡廳

145

◎我認為我是必要的——訪作家莫言／舒晉瑜

153

◎故鄉、夢幻、傳說、現實——著名作家莫言訪談錄／石一龍

160

◎莫言訪談錄

201



莫言演講集

一·小說在寫我

在小說
寫我

我為什麼要寫《紅高粱家族》

——在《檢察日報》通訊員學習班上的講話

《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八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一九八四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最初的靈感的產生帶有一些偶然性。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其間，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發言，是這樣說的：「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陷。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

鬼子拚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過。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歷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爭。」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對此嗤之以鼻。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一「小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說我是碟子裡扎猛子不知道深淺。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上。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說。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酌。我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主要目標是再現戰爭過程，一部小說其情節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爭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是不是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義。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化。譬如前蘇聯的一部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務。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部隊被打散，她與一個英俊漂亮、很有藝術修養的白匪軍官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天長日久，兩個人產生了感情，開始同居，各自

都把自己的階級身分忘記了。突然有一天，來了一條白匪的大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甦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上。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驗。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八〇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封閉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的。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之後，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鄉。我小時候，氣候也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氾濫，種矮桿莊稼會淹死，只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桿很高。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地。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桿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障。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裡上演。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裡，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象徵了民族精神。確定了這個框架後，我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在新時期文壇產生了影響的作品。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村。當時日本鬼子為了報復某個村莊的村民對他們的攻擊，準備對這個村莊進行報復。在路上，因為一個人指錯了

方向，使得另一個村莊的一百多個百姓慘遭殺害。

《紅高粱》塑造了「我奶奶」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並造就了電影《紅高粱》中的扮演者鞏俐。但我在現實中並不了解女性，我描寫的是自己想像中的女性。在三〇年代的農村現實生活中，像我小說裡所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個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說中的女性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區別的，雖然她們吃苦耐勞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種浪漫精神是獨特的。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性。《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性。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裡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角。寫到「我」的時候是第一人稱，一寫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內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達出來，敘述起來非常方便。這就比簡單的第一人稱視角要豐富得多開闊得多，這在當時也許是一個創新。

有人認為我創作《紅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馬奎斯的影響，這是想當然的猜測。因為馬奎斯的作品《百年孤寂》的漢譯本一九八五年春天才在中國出版，而《紅高粱》完成於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在寫到《紅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時才讀到了這部了不

起的書。不過，我感到很遺憾——為什麼早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呢？假如在動筆之前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作品，估計《紅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樣子。

我認為，像我這種年紀的作家毫無疑問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為在八〇年代以前中國是封閉的，西方文學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作家出現，出現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是不知道的。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學被翻譯進來，我們有一個兩、三年的瘋狂閱讀時期，這種影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從而不知不覺地就把某個作家的創作方式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來了。

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西。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野」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響。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運。

我與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

——在台北圖書館的演講

一九九八年十月

大多數所謂的文學思潮，與用自己的作品代表著這思潮的作家沒有什麼關係。小說是作家創作的，思潮是批評家發明的。批評家發明思潮的過程就是編織袋子的過程。他們手裡提著貼有各種標籤的思潮袋子，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作家或是作品裝進去，根本不徵求作家的意見，這叫做「裝你沒商量」。我經常給裝進不同評論家的貼著不同標籤的袋子裡。有現實主義的袋子，有浪漫主義的袋子，有新感覺主義的袋子，有魔幻現實主義的袋子。有的袋子裡氣味美好，待在裡邊感到很舒服，有的袋子裡氣味齷齪，待在裡邊很不舒服。

有一個名叫張清華的人寫了一篇長達兩萬言的文章，題目叫做〈十年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回顧〉，發表在大陸著名的文學刊物《鍾山》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袋子。在這個袋子裡裝著張煒、蘇童、賈平凹、葉兆言、格非、陳忠實等一大群人，當然我也在其中。他幾乎將目前大陸比較活躍的作家一袋打盡了。在這條袋子裡，作家們像麻

雀一樣衝撞不止，尤其是那些比較年輕的麻雀是絕不甘心讓人裝進這樣一條袋子的。但在堅韌的袋子面前，不甘心也沒辦法。

我對批評家非常尊重，尊重批評家是因為我沒有理論素養。尤其是讓我寫理論文章的時候，我對批評家更是尊重。這次兩岸作家會議分配給我的題目是「九〇年代文學思潮」，從接到題目那天起我就開始發愁。正當我一籌莫展，甚至想到北大中文系雇一個文學研究生做槍手時，突然發現了張清華這篇文章。看完了這篇文章我感到高興極了，困擾了我數月的問題終於可以解決了。張清華的文章簡直就是為我寫的，既然有這樣現成的文章我何必去自討苦吃？於是我就把他的文章選了一些我喜歡的片斷抄來了。我想這也算不了什麼。他往袋子裡裝我沒商量，我抄他也沒商量。當然也不能完全照抄，在抄的過程中我多少也加了點私貨。

張文認為：在八〇年代中後期到九〇年代中後期，大概十年的時間裡，當代中國文學在詩歌和小說領域、尤其是在小說領域出現了一股強大而持久的帶有「新歷史主義」觀點和傾向的文學思潮，現代主義的史學觀念、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等新的史學哲學方法是其產生的基礎。從發展的階段來看，它主要經歷了三個時期：尋根、啟蒙歷史主義是其前奏；新歷史主義或審美歷史主義是其核心階段；遊戲歷史主義是其餘波和尾聲。